

程代熙文集

第8卷 ■ 译文

长征出版社

程代熙文集

第八卷

(译 文)

长征出版社

目 次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

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	(2)
别林斯基的文学观	(86)
尼·加·车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	(163)
杜勃罗留波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	(229)
概念的混乱(列·尼·托尔斯泰的学说)	(268)
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	(298)
论工人运动的心理(马克西姆·高尔基《仇敌》)	(328)
译后记	(361)

沃罗夫斯基文论选

论马·高尔基	(374)
“黑暗王国”里的分崩离析	(402)
夏娃和江孔达	(433)
“忐忑不安的人”和“盯住不放的人”	(449)
《一个古老城堡的传说》 ——文学漫评	(465)
父与子	(471)
纪念“激烈的维萨里昂”	(479)
文集跋	(487)

普列汉诺夫美学 论文选

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

Lucifer. Was not thy quest for knowledge?

Cain. Yes; as being the road to happiness.

Byron. "Cain"^①

那时我们除了纯粹思维以外，已经在哲学里把世间的一切都翻找了一遍。

伊·谢·屠格涅夫^②

-
- * 本文首次发表在《新言论》杂志 1897 年 7 月第 10 期和同年 8 月第 11 期上，当时的标题是：《俄国批评的命运·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作者署名为 H. 卡明斯基。本文曾收进作者的文集《二十年间》的《俄国批评的命运》部分，先后重印过三次。

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以及他为研究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写的其他一些文章，曾在报刊上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有的表示赞同作者的看法，有的则对作者进行了严厉的攻讦。

别林斯基是普列汉诺夫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从 1897 年起，大约在十五年间，普列汉诺夫撰写过近十篇专论别林斯基的文章，其中有的还是煌煌巨制，如本书中所收入的两篇。

- ① 卢息弗，你不是曾追求过知识吗？

该·隐：是的，因为知识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拜伦：《该隐》。

- ② 参见伊·谢·屠格涅夫：《文学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回忆》第 2 章，《回忆别林斯基》，见《屠格涅夫全集》，俄文版，第 10 卷第 280 页。

伏伦斯基先生说：“大多数俄国的批评家都提出黑格尔影响了别林斯基的世界观这个重大课题，可是谁也不曾拿别林斯基的某些观点同其最初的出处作过直接的对比分析，谁也不曾以应有的注意对其美学思想的真正的内蕴作过考察，而且也没有人根据一定的理论的准绳，对它们作出过公正的判断。”^①

这一切都毫不足奇，因为在伏伦斯基先生出现之前，我们不仅没有“真正的”哲学，也没有“真正的”批评。如果说我们还多少知道一点什么的话，那我们也是稀里糊涂地知道的，而且也讲不出所以然来。现在好了，多亏伏伦斯基先生，我们很快就可以使我们那点贫乏的知识变得条理清晰和充实起来。伏伦斯基先生是众望所归的领袖。现在我们不妨就来看看，比方，他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来解决“黑格尔影响别林斯基的世界观这个重大课题”的。

“别林斯基的思想，就其成长和发展来说，一方面是受了斯坦凯维奇小组^②的影响，别一方面则是他把从纳杰日津^③的文章中获得的印象进行了独立的加工整理，所以

① 阿·伏伦斯基：《俄国批评》，第38页。——作者注。

② 指以尼·弗·斯坦凯维奇为首的一些莫斯科大学的青年在1833年前后建立的一个研究文学和哲学的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除别林斯基外，还有康·阿克沙科夫、鲍特金和巴枯宁等。

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纳杰日津(1804—1856)，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史学家，《杂谈》和《望远镜》杂志的主编，别林斯基曾在这两个刊物上撰稿。

它很快就达到了它的顶峰。别林斯基的谢林时期在一八三七年就已经结束，而他在同朋友间的谈话中、从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和译文中才了解到的黑格尔哲学，则在他所从事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恰恰就在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别林斯基还无力从复杂的哲学定理中作出具有独立见解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将其应用于政治的民事问题。别林斯基不善于进行系统的思维。黑格尔的学说使他惊讶莫铭，但他又无力对这个学说的所有组成部分和结论加以研究。黑格尔使他神驰，但却并没有推动他去从事精神创造。他应当悉心地全而分析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应当暂时停止幻想，但不要听任感情的驱使，以便今后给它装上新的翅膀。可是别林斯基却不安于对真理的探索，他了解到的全部黑格尔哲学，就有如他通过纳杰日津的叙述而对谢林的迷恋一样，就终会退化为一堆乱七八糟的思想、充满各种各样逻辑上的谬误及怪诞的幻想而走向调和与保守。”^①

所以，伏伦斯基对于别林斯基同现实的暂时调和感到不胜的惊讶。他对这种情况能作出的唯一解释是：别林斯基对黑格尔一知半解。老实说，这种解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伊·谢·屠格涅夫的回忆录，甚至在尼·斯坦凯维奇在论鲍罗金诺以及论门采尔的著名文章发表后立即写给涅维罗夫^②的一封信里，都可以找到这种解释。其实，只有挖苦别林斯基无知以及巧

① 阿·伏伦斯基：《俄国的批评》，第90页。

② 雅鲁阿里·米海洛维奇·涅维罗夫(1810—1893)，俄国教育家。

妙地暗示他伏伦斯基先生——“我们时代的普罗米修斯”，才是无可争论和无可比拟的才学之士的那些话，才是他说的。

乍一看，伏伦斯基先生所作的那番解释（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好象还颇有些头头是道。黑格尔声称：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①，而别林斯基就据此把当时非常不美妙的整个俄国现实，不假思索的说成是合理的，因而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他还对凡是不满这种现实的人横加攻讦。他的那些表露出这种调和观点的文章，正如当时温和而稳健的开明人士格兰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是“卑劣的”文章^②。但是这些文章怪罪不了黑格尔，黑格尔的几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学说具有未被别林斯基理解的特别的意义，因为别林斯基既不懂德文，又不具备“纯粹思维”的能力。后来，特别是在迁居彼得堡之后的影响下，他才发见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才认识了我国现实的真正性质，并且诅咒他自己所犯的致命的谬误。还有什么比这更一目了然的呢？唯一叫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简单的说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

我们无意对这种说明的所有不同的说法来一番详尽的考察，我们要指出的是，我们当今那班“进步的”patriae

① 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② 格兰诺夫斯基在1840年7月19日给雅·米·涅维罗夫的信里写道：“记住，别林斯基就鲍罗金诺等等所写的那些卑劣的文章，В-и（即巴枯宁）是第一个起来反对这些文章的，——可是谁愿意写这种文章的呢？他比别林斯基还要心灵手巧一些，（季·尼·格兰诺夫斯基，《斯坦凯维奇传略》），莫斯科，1869年，第114页。

patres^①（也是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是用《圣经》上的父亲饶恕浪荡儿子“年轻时的错误”那种眼光来看待评论鲍罗金诺和门采尔^②的文章的，他们也宽宏大度地饶恕了这位天才批评家的“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误，他们这些“进步人士”不愿总是炒冷饭，正如俗话说：“谁念旧恶，就挖掉他的眼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时不时地暗示说，他们这班“进步人士”，几乎还在襁褓中就懂得了全部哲学和社会学的真谛，非常了解这些谬误的来龙去脉，而且也看到了由于不适当的和不明智的——所幸还只是一时的——热衷于“形而上学”，而使别林斯基“摔了跤子”的整个可怕情况。有时还向那些年轻的作家，既不恭顺的文学“桂冠们”提到摔这种跤子的情况，这班文学“桂冠”居然敢于怀疑我们这个“进步的”教义问答的正确性，并反而去求助于外国的资料，想借此更好地弄清那些激动着现代文明人类的问题。他们对这班青年作家说：你们看，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也有这样的情况，青年作家被这样的下场吓坏了，原来不恭顺的桂冠们变得恭顺了，并且可笑地向外国的“哲学帽子”^③告别，按照我们土里土气的“进步公式”明智地

① 祖国的缔造者。

② 指别林斯基的评《鲍罗金诺战役^④述评》和《门采尔^⑤，歌德的批评家》两篇文章，别林斯基的与现实调和的观点在这两篇文章里表现得非常鲜明。

③ 指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俄军在莫斯科近郊鲍罗金诺对法军的一次有力的反击。

④ 沃尔夫冈·门采尔（或译孟采尔，1798—1873），德国作家、资产阶级激进的文艺批评家，他曾大肆抨击歌德、席勒及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

⑤ 指哲学家。

“前进”。于是，又拿别林斯基的例于来巩固我们那班“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家”的权威了。

用社会学家之一，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①的话来说，别林斯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的伟大殉身者。他具有艺术批评家的才华。“在许多年之后，很多批评家甚至连批评的方法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别林斯基的一些审美判断将会一直有效。不过，别林斯基也只是在这个领域才给他自己找到了几乎是无穷的快乐。只消审美现象被哲学和道德及政治的原则弄得复杂起来时，他对真理也就不那么敏锐了，这一点就终于使他成为他在通信中所说的真理的伟大殉难者，尽管他对真理的追求仍然一如既往^②。

如果说，只消审美现象由于哲学、道德及政治原则而变得复杂起来，就往往会使别林斯基失去辨识真理的能力的话，那么这就不言而喻，这条总的原则也完全适用于他热衷于黑格尔哲学的时期。显然，这整个时期除了引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这位“真理的伟大殉身者”的怜惜，以及可能还有对“形而上学”的愤懑之情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他的那种怜惜是跟深深的敬重之情交织在一起的。不过，那只是对于别林斯基真诚不苟的为人的敬重，至于说到他的哲学、“道德及政治”观念，那么，米海洛夫斯基认为除了“一派胡言乱语”之外，就再无别的任

①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首领。

② 参见巴甫连柯先生用来装潢他出版的别林斯基文集的一篇文章：《蒲鲁东和别林斯基》。——作者注。

何东西了。

其实，对别林斯基与现实暂时调和的这种看法，跟我们上文所引证的伏伦斯基的看法并无轩輊之分。所不同的只是在于，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看法，这种调和“是由黑格尔造成的”，倘照伏伦斯基先生的见解，——其实，他承袭的就是斯坦凯维奇、赫尔岑、格兰诺夫斯基等人的见解，——黑格尔与这种调和根本无关。但他们二人，即伏伦斯基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都深信，别林斯基的调和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不管这两个大人物——其中一个在社会学方面，而另一个在哲学方面都有着同样深邃的造诣——的见解是如何的权威，我们还是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我们认为，恰恰是别林斯基在其发展的调和时期，而且恰恰是在这个“道德及政治”的领域，他所披露的许多思想，不仅完全和有思想的生物（如拜伦所说的那样）相称，而且至今也还值得那班想找到正确观点来评价我们周围现实的人们注意。为了对这个论点加以论证，我们不得不把话题稍微扯远一点。

二

一七六四年，伏尔泰在给索维兰^①的一封信里曾预言法国旧的社会制度即将崩溃。他补充了一句：“Ce sera un beau tapage, les jeunes gens sont heureux; ils verront de

① 贝尔纳·路易·德·索维兰(1716—1773)，侯爵，法国外交官，驻都灵的使节。

belles choses.”^①伏尔泰的这个预言在如下的意义上说是实现了，那就是，这场“tapage”^② 的确是非常美好的；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跟这位费尔内长老^③ 一派的，而且活到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是不喜欢这个“浩劫”的。这个长老并不赏识“群氓”，而上世纪末的那次“tapage”^④ 就主要是“群氓”搞起来的。诚然，在某一段时间，“群氓”所作所为是跟“有身分的人”，亦即彬彬有礼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外表相称的。但是“群氓”逐渐地放肆起来，变得如此地无礼、野蛮和好斗，于是，那些“有身分的人”感到他们自己竟然败在那班既可怜而又不文明的群氓手下，而陷于绝望的境地，就进而真诚地怀疑起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之采取行动的理性的力量来了，原来理性是应该把它的体现者和代表，也就是有教养的资产者置于事变的领导地位。从一七九三年起，那班感到自己被没有意料到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群氓的胜利所征服和吃了败仗的人，对于理性力量的信仰就大大地减弱了。接着而来的那些与无休止的战争和变革有关的事件，就使得军事力量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结果弄得所有那些本来认为自己拥有不可争辩权利的有教养的人，更加失望不已；因为战争和变革嘲弄的正好就是理性的要求。所以我们看见，到十八世纪末，对理性的信仰一落千丈，尽管执政时期和督政时期的那班所谓的思想家还在照老皇历歌颂理性和真

① “这将是一次大浩劫，青年人有幸将看到非常美好的东西。”

② “浩劫”。

③ 指伏尔泰。

④ “浩劫”。

理(la raison et la vérité),然而他们身上已经全无先前那种令人鼓舞的劲头了,而且影响也微乎其微;公众根本不听他们的,公众如象朋齐·彼拉多^①那样,现在带着怀疑的微笑问道:“什么是真理呢?”对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情况非常熟悉的斯塔尔夫夫人^②说:被可怕的事件吓坏了的“多数”(la plupart des hommes),自我完善的任何愿意都丧失殆尽,而且这个“多数”“慑于偶然的强大力量,已不再相信人的才能的力量了”^③。

对理性力量的失望,远远越出了法国的国境,这里须顺便指出的是,这种失望还在拜伦的作品里找到了它的代表。曼弗雷德^④称哲学为:

of all our vanities thie motliest,
The merest word that ever fool'd the ear

① 朋齐·彼拉多(?—约公元前39),罗马帝国所属底维尔的犹太教的首脑。

② 安娜·路易莎·热尔门·德·斯塔尔夫(1766—1817),法国女作家。

③ 《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Introduction, p. X VII. 她还在这同一篇导言的第4页上说得更为有力,她说道:“les contemporains d'une révolution, perdent souvent tout intérêt à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Tant d'événements décidés par la force, tant de crimes absous par le succès, tant de vertus flétries par le blâme, tant d'infortune insultée par le pouvoir, tant de sentiments généreux devenus l'objet de la moquerie, tant de vils calculs philosophiquement commentés, tout lasse de l'espérance les hommes les plus fidèles au culte de la raison.”〔《联系社会制度来考察文学》,导言,第18页……“革命的同时代人……往往失去探索真理的任何兴趣。如此之多的诉诸武力的事件,如此之多的罪行竟以成则为王来进行辩解;如此之多的德行被丑行诋毁;如此之多的灾难竟是当局造成;如此之多的崇高感情竟成了嘲笑的对象,如此之多的愚蠢打算居然得到哲学的论证,——这一切就使得最崇拜理性的人都失去了希望。”〕——作者注。

④ 拜伦同名长诗里的主人公。

From out the schoolman's jargon. ①

拜伦认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及政治事件都是开的毫无意义的和残酷无情的玩笑，是与人为敌的“涅米赛兹”②，亦即同一个偶然性。同时，他的自豪感使他对这种盲目力量统治的反抗。别林斯基也许会说，曼弗雷德的激情正是自豪的人的精神对盲目的“命运”的反抗，也正是人立志要征服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黑暗势力的宗旨。曼弗雷德通过魔术部分地解决了这个任务。但是，不言而喻，只是在幻想的领域里才使这个任务得到了如此的解决。

第三等级的理性，确切地说，即竭力想使自己摆脱旧制度压迫的资产阶级的理智是经不起它所承担的严峻的历史考验的；这种理性已经失去了根据；就连资产阶级自己都对它感到绝望。但是，如果说单个的人，即使为数很多，对这种绝望居然心安理得，甚至还拿它来夸耀，那么，对于整个阶级，对于全部 ci—devant ③ 第三等级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快速发展的、巨大的和变幻无常的政治事件就使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社会活动家怀疑理性的力量。正在向前发展着的这

① ……竟出乎我们的想象，
世上最污七八糟的东西，
竟是出自学者底谰语的
最骗人耳朵的空话。

② 涅米赛兹，古希腊神话中司天罚的女神。

③ 从前的。

些事件又给予社会思想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并且促使那班喜欢动脑子的人重新尝试去寻找社会现象的潜力。

在法国复辟时代，资产阶级同（世俗和教会的）贵族阶级的许多世纪的争执，又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以新的力量而热烈起来。处在这个斗争中的双方都必须具有某种能多少预见到事件发展的能力。虽然绝大多数的战士，在这方面能够依赖的只是他自身的“常识”和“生活经验”，但是，在当时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充满新鲜的力量，而且在二十年代初，就涌现了不少仁人志士，他们企图通过科学的预见来战胜盲目的偶然性的力量。这种企图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必须建立社会科学的议论；这种企图还使得历史学领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活动家。但是，对现象进行科学研究恰恰就是理性的事情。这样一来，社会发展的进程又复苏了对理性的信仰，尽管在理性面前提出来的是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所不了解的，或者至少也是他们了解得很少的任务。

那个世纪的理性是“启蒙者”的理性。启蒙者的历史任务是对于历史地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制度和概念的各种材料，用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和新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新思想的观点来作出评价。当时需要的是能尽可能迅速地 and 正确无误地辨别母羊和公羊^①、“真理”和“谬误”。至于这个“谬误”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则完全不必过问；重要的是要证明，它不过是一

① 典出《圣经·马太福音》第 25 章：“如象牧人识别绵羊山羊一样”；意谓能辨别善恶、利害。

个“谬误”。

凡是与新的思想矛盾的，都被当成是谬误，同样，凡是符合新思想的，就被认为是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

文明的人类并不是只经历了一个启蒙时代。诚然，每一个启蒙时代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又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点：为了新的思想，为了被认为是不以任何“偶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永恒的真理，而同旧的概念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启蒙者的理性不外乎就是革新者的理智，这种革新者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宣称他自己的本性就是普遍的人性，并把他的哲学宣称为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唯一真正的哲学。

由于十八世纪的 *tapage*^① 而遭到破灭的，正是这种抽象的理智。*Tapage* 表明人类在其历史运动中都得服从他自己不理解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的某些隐蔽力量的作用，只要理性的力量跟那些隐蔽的力量发生冲突，后者就无情地将其摧毁。

对这些隐蔽的力量——最初就是以盲目的“偶然性”的力量表现出来的——进行研究，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所谓道德及政治学的所有学者和思想家的宗旨^②。

① “浩劫”。

② 在圣西门的著作里，对这一点说得最清楚，他说：“La science de l'homme n'a été jusqu'à présent qu'une science conjecturale. L'objet que je me suis proposé dans ce mémoire a été de lui imprimer le cachet de science d'observation ((*Mémoire sur l'ascience de l'homme*))”〔“人学在目前为止还是一门建立在推测基础上的学问……在本书里，我的宗旨是要把它变成一门以观察作基础的科学(《人学概论》)”〕^③——作者注。

③ 圣西门的这段话，可参见《圣西门选集》，上卷第103页的脚注，商务印书馆。

十八世纪忽视了历史。现在是人人都在钻研历史。但是历史地研究某一现象,就是说要从发展上来对它进行研究。发展的观点就逐渐在十九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中占了统治地位。

我们知道,发展的观点曾给德国的哲学,也就是给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带来了特别丰硕的成果,这个国家只是在理论上(通过它的思想家)能够同其他先进的欧洲国家并驾齐驱,那是因为它不关心实际斗争,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掌握思想科学的一切成果,并且仔细地去研究“西方”(即当时德国人经常讲的那个“in den westlichen Ländern”)所发生的社会运动的原因和结果。十八世纪末法国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一直到九三年^①都得到德国进步人士的极大的同情;这一年使得大多数人胆战心惊,并使得他们怀疑理性的力量,犹如文明的法国资产阶级所经历过的情况那样。但是当时正处在全盛时期的德国哲学一眼就看出了用什么方法就可以战胜偶然性的盲目力量。谢林在他刚刚在十九世纪初(一八〇〇年)付梓问世的《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②一书里写道:“自由中应该有必然性。”这就是谓:自由只能是某种必然的,即合符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合符规律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就应该成为自由的所有真正朋友的首先须要履行的义务。十九世纪的丰富多采就表现为拥有各种各样伟大的发现。把自由作为必

① 指1793年。

②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